

# 蔡昉：失去“世界第一人口大国”头衔，中国需要担心吗？(中)

服务业有所发展，一部分人也接受过高等教育，但规模还不够大。因此，从人口红利的角度上来说，当劳动力数量优势减弱时，未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劳动力质量，培育人才红利，对中国来说就显得更加重要。

**中新社记者：中国仍有超过14亿人的巨大人口规模，当下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从中挖掘经济增长潜力？**

蔡昉：人口红利的含义就是，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，同时由于年轻一代往往比上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，新成长劳动力不断涌现，就可以带动人力资本快速增长。这种情况下，不管投入多少资本，总会有相应的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进行匹配。此外，从农业等其他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还有大量劳动力可以转移出来，重新进行资源配置。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能力。

当前中国人口虽然出现负增长，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所减弱，但依然有巨大潜力可以挖掘，比如从农业向外转移的劳动力规模就依然巨大。我们谈论劳动力充足与否时，主要针对非农产业的需求。据统

计，发达经济体农业劳动力占比约为3%，中国则高达23%，缩小两者之间20个百分点的差距，意味着规模巨大的劳动力可以在今后10年到20年里从农业中逐渐转移出来。为此，要用改革的办法挖潜，比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，让农民工落户城镇等。

此外，未来经济增长会受到需求侧制约，特别是要应对居民消费不足问题。进入老龄化社会，老年人消费能力相对较弱，养老负担也会改变消费观念、挤压消费意愿。在此背景下，要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。一方面，政府要在生育、养育和教育等方面强化公共服务保障；另一方面，在就业政策方面要提供更高质量培训，促进人力资本发展。一旦劳动者就业更充分、纵向流动

更快，其收入和消费能力也会水涨船高。总的来看，无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，都存在改革红利，这种改革能够直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，让所有人从中受益。

**中新社记者：全球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正经历人口负增长。应对人口新形势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，中国是否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？**

蔡昉：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一只“灰犀牛”，但也可能产生未曾预见的“黑天鹅”事件。吸取其他国家经验教训，避免人口转变冲击经济增长，需要关注四个关键词。

第一，日本式应对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，潜在增长率降低，供给侧增长能力显著下降。但此时，日本在提高

生产率、增强供给侧能力方面没有什么作为，决策层和经济学者普遍认为症结在于需求侧冲击，因此推动了大规模刺激投资需求的政策，推起了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泡沫。最终日本又不得不捅破泡沫，陷入“失去的三十年”。

第二，欧美经济的“日本化”。欧美发达国家整体都遇到了老龄化、人口增长停滞等问题，导致投资意愿不足、消费下降、过度储蓄，进而又造成低利率、低通胀、低增长。为了刺激经济，这些国家只能提高负债率，最后形成了“低通胀、低利率、低增长、高负债”“三低一高”的长期停滞格局。这一现象从日本开始，随

后欧洲、美国都出现了该趋势。

第三，疫情中断(Covid Break)。新冠疫情让欧美经济的“日本化”趋势暂时中止。疫情期间，欧美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加以大规模财政刺激，为居民发放大量补贴，从而对消费形成支撑。但由于供应链中断导致的供给短缺、乌克兰危机等原因导致的石油、粮食等供给和价格冲击，令其供给侧在需求并未减弱的情况下遭遇供给不足，导致数十年未见的高通胀，最终不得不转头加息。

第四，“日本化”的变种。我们尚难以确定欧美加息之后会出现怎样的格局，是回归“三低一高”的长期停滞



在江苏省海安市大公馆便民服务中心开设的老年人手机公益课堂上，志愿者指导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。翟慧勇 摄



2022年冬季，顾客在纽约中央车站市场询问奶酪价格。美国在当年遭遇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。消费者价格指数(CPI)同比涨幅在6月达到9.1%的峰值后，一直保持在7%以上的高位，持续“高烧”的通胀令经济承压。廖攀 摄